

正中文藝叢書

王志健著

文學論



文
學
論



究必印翻

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臺初版
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臺六版

正文書畫叢藝文論學

基本定价五角一冊全

(外埠加運費匯資)

編者著者王志健儒廉人行發行印刷局書中正

新局出書業登記證聞出版事業業主九九一〇字第號利(6135)

(500)

正中書局

CHENG CHUNG BOOK COMPANY

地址：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

Address :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總經理室電話：3821145 諸務部電話：3821147

業務部電話：3821153 門市部電話：3822214

郵政劃撥：九九一四號

海外總經銷

OVERSEAS AGENCIES

香港總經銷：集成圖書公司

總辦事處：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

電話：3-886172-4

日本總經銷：海風書店

地址：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

電話：291-4345

東海書店

地址：京都府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八番地

電話：791-6592

華南總經銷：集成圖書公司

地址：泰國曼谷耀華力路233號

美國總經銷：華強圖書公司

Address : 41 Division St., New York, N.Y. 10002 U.S.A.

歐洲總經銷：英華圖書公司

Address : 14 Gerard Street London W.L. England

加拿大總經銷：嘉華圖書公司

Address : China Court, Suite 212-208 Spadina Avenue, Toronto,

Ontario, CANADA M5T 2C2

文學論目次

第一章	文學的涵義	一
第二章	文學的特性	二六
第三章	文學的思想	四三
第四章	文學的情感	六九
第五章	文學的想像	八五
第六章	文學的語言	一一四
第七章	文學的背景	一三一
第八章	文學的素材	一七三
第九章	文學批評	一五一
第十章	現代文學	一八一

第一章 文學的涵義

文學一詞，原來是我國所固有的。固有的文學的涵義，範圍是極為廣泛的；今人對文學的觀念，則已化繁為簡，趨向狹義的文學範圍了。

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，本不易明確的劃分。但在文學的演進與變革裡，猶如濁水之化為清流，離騷、唐詩、西廂記、紅樓夢等作品進入純文學的殿堂；而曆書、布告、麻衣相法、觀光指南等文字退出了文學的長廊。並依此而發現到自然精粹，圓滿充實的藝術美，如何使文學的思想、感情、想像、和表現技巧，以及語言文字，在其實體和本質上，形成為獨具的特性。

要說明文學一詞的涵義，仍需要從歷史的發展裡，尋求其脈絡；同時亦需要借重過去經驗和資料，來予以簡單扼要的敘述。

為了方便起見，我們把前人對於文學的各種觀念，劃分為幾個段落來看：

壹、先秦學者首倡文學

儒家論文的話，早見於尚書、易經；周禮之中，詩樂合論，均以教化為本。論語記孔子與其弟子對話，其中論文與論詩之處甚多；孔子認為文學對於人類思想、政治、教育、倫理、生活和行為各方面，都發生極大的影響力。所以孔子教學分類：以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四科並行並

重；在這四科裏，各選其有特殊成就的異能之士，為領袖人才。

論語先進篇：「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」

在文學這一科中，子游和子夏二人，因同具專長，都有卓越崇高的名聲。沈氏德潛在吳公詞堂記裡說：

「子游之文學，以習禮自見。」

禮在當時是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標準行為，子游是溫柔敦厚，恭儉莊敬的君子；所以：

「當時公卿大夫士庶，凡議禮弗決者，必得子游之言，以為重輕。」

在衆口嘵嘵的場合中，意見紛歧，莫衷一是；唯子游的一句話，便可排難解紛，而沒有不順服的；由此想見子游煦然和雍的神貌和風度。

而子夏是怎樣呢？朱彝尊文水縣卜子詞堂記裡述徐防的話：

「詩書禮樂，定自孔子；發明章句，始於子夏。」為的是：

「文章之可得聞者，子夏無不傳之。」

子夏是位著述家，在記述文學方面，成為孔子得力的助手和繼承人。

文學的功用是什麼呢？

論語學而篇：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

此處指弟子入孝出悌謹信汎愛衆而親仁的行為之外，需用力學文。而學文正所以輔導弟子孝悌諸行，更進一步的意思。

述而篇：「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。」

孔子教人，以文爲先。

雍也篇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

其目的不僅要以學文爲先，而且更要博學於文；使君子的作爲，不至於違道。

所謂的道，就是指當時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。

泰伯篇：「煥乎，其有文章。」

以此煥然耀眼的文章，傳播詩書禮樂、刑政制度於世。

綜上所述，可知孔子的意思，是將文、文學、文章合一而爲所有學術的總名。孔子在斯時是極深於文學的人，他常以斯文自任，以垂世之文自命。所以孔子刪述六經，以樸茂淵懿之文載道。六經中的詩作品是真情洋溢，散文作品則是純美深厚。孔子謙稱述而不作，其實他是傑出的文學大家。

先秦諸子中，儒墨二家都是崇重文學的。

荀子大略篇：「人之於文學也，猶玉之於琢磨也。詩曰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；謂學問也。和之璧，井里之厥也，玉人琢之，爲天下寶。子貢、季路，故鄙人也，被文學，服禮義，爲天下列士。」

文學之爲用，需切磋琢磨，始能愈顯其大。荀子在此處，說得十分透澈清楚。

墨子非命篇：「子墨子曰：今夫天下之爲文學出言談也，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，中

實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也。」

墨子將文學之對於國家邑里萬民刑政的功用，也說的極爲明白。

韓非子以法家嚴酷的觀點，雖反對文學之士，但亦認爲：「國用詩書禮樂爲悌善修治者」，亦就是那些「詩書辨慧者」；同屬於從事學術修行的人。

先秦學者首倡文學，並以文學代表一切學術的總名。

此時的西方，特洛伊（Troy）戰爭，和爲盲詩人荷馬（Homer）所彈唱的敍事長詩，已經過約五百餘年。晚生於孔子（公元前五五一年）八十四年的希臘哲人蘇格拉底（Sokrates），正綜合了前人的學說，將真歸之於感情，將美歸之於審美觀念，將善歸之於理性，而爲西方產生了更高的道德標準。

貳、漢至南北朝的文學新觀念

文學之被稱爲一切學術的總名的觀念，延至文治武功極盛的漢代。尤其漢武帝表章六經，成爲儒家全盛的天下。

史記儒林傳：「夫齊魯之間於文學，自古以來，其天性也。」

我民族文化發端之古典時期，在於周。其後，詩經是黃河流域的文學產品。六經的產地，亦在黃河流域。因此，齊魯之間的文學，如詩經等之歌詠傳播，是由來有目的。

漢書西域傳：「諸大夫郎爲文學者。」

此處所指文學，是屬之於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春秋、樂六經的範圍；文學，概括地謂經學。孔子雖然沒有形成一種文學流派，但他刪述六經，却影響到文學的本體，和文學的發展。六經的內容，到漢時更關係到人生的各方面；分述如下：

一、詩：關係修身：

論語爲政篇：「子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」

讀詩的態度是「思無邪」，言其音質美，內容美；爲自然的形式，爲真情的流露。

泰伯篇：「子曰：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

興於詩者，是修身之道，需要先學詩。

陽貨篇：「子曰：小子何莫學夫詩，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

詩之爲溫柔敦厚者，正所以教人以做人的道理；而博物多學，才可以增加人的識見。

其次，詩並關係到教人處事：

子路篇：「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；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」

子答伯魚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

八佾篇：「子曰：起予者，商也；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」

學詩不僅關係到德行，並關係到言語、政事；這正是君子的作爲，可以替國家萬民服務。子夏能知孔子的意思，是可與言詩的。何況不學詩，便難於應對。學詩可以幫助一個人怎樣

處事。

尤有進者：

學而篇：「子貢曰：詩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；其斯之謂與？子曰：賜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

詩言志，自然包含了表意達情的要素。

禮記：「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。其爲人也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……其爲人也，溫柔敦厚而不愚，則深於詩者也。」

詩不僅能言志，同時能表達個人的情意；而且可以用以觀民風，用以觀政。

孔子是以詩教爲修身治事之本，並以之來行其道的。

二、書：

書經的內容，述帝王聖賢的德政；其中的文章渾厚莊嚴，使人產生肅穆恭敬的情緒。

三、易：

易經中的散文，極爲優美，並富於哲學深意。

四、禮：

其中儀禮篇記載先民生活。周禮敍述古代政刑制度。禮記篇之文，或行雲流水，或古雅樸茂，或氣勢縱橫，或情韻生動。蘇東坡以熟讀檀弓的簡鍊文章，可得俊辯之益。陳壽祺以禮記之文爲：「其旨遠，其辭文，其聲和而平，其氣淳而固，其言禮樂喪祭也，使人孝悌之性油然而生。」

生。學者沈浸於是，苟得其一端，則抒而爲文，必無枝多游屈之弊。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，故粹美如是也。」

五、春秋：

尚書記言，春秋記事；同屬古代史書。啓鑿振聰，揚善懲惡；故而有：「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。」的話。

六、樂：

孔子言政言教，均以禮樂並重。他對樂是有特殊興趣的。孔子在齊，聽到詔的那種遏雲繞梁的音樂，使他有三月不知肉味的感想，有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」之嘆。他在樂記裡說：「揖讓而治天下者，禮樂之謂也。」太史公說：「詩有之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」讀禮記裡的文字，是非常引人入勝的。

漢代諸大夫郎之爲經學，是趨向修齊治平之道；是政治的，倫理的，是發揚總攬儒教學術的文學。朝廷並設有掌理文學的官，推行經學，以達到天下學士「通經致用」的目的。漢的強大力量，能使文化興盛遠播。同時，拓展領域，吸收新知，發皇藝術；文學的新觀念，產生出新創作。南北文學的匯合，在文學上是兼容並蓄。史記、漢賦、樂府，到建安文學，是時代演變下的必然產品。漢時，佛教逐漸傳入我國。漢小說雖多失傳，但從神話故事到傳奇故事，在文學的發展中，當是意會得到的一種方式。

漢魏樂府其最動人者，是注入自然美和想像美的文學色彩，並從廟堂文學、貴族文學走到平

民文學。漢末時的敍事長詩「孔雀東南飛」，已臻於字字真切，語語血淚，如聞其聲，如感其悲的境地。到建安文學的悲涼悽傷，多為真情的流露。文學的觀念，亦在暗中隨流年而變換着。魏文帝曹丕典論論文篇：「蓋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壽有時而盡，榮辱止乎一身；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」在其見解上，文章可以經國，可以達到無窮，是乃不朽的盛事。只此不朽一點，已確立了文學的永恒的價值。

漢後，南北朝的文學，有很大的發展；同時在繪畫、建築、雕刻、陶瓷、書法、織品藝術各方面，也都有飛躍的進步。如南方藝術中三大畫家，顧愷之細膩高雅的意味，陸探微深刻明透的性格，張僧繇沈長闊大的風格，在在都形成爲不世的傑作。後此約二千一百多年，才有西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·芬奇 (Leonardo da Vinci 1452—1519)、米開蘭基羅 (Michelangelo 1475—1564) 及拉菲爾 (Raphael 1483—1520) 的畫。南北朝時期的文學，交溶於諸種藝術的相互激盪中，走上了訴諸美的感情作品的路線；這些以抒情爲主的創作，自然地歸屬於純文學。由創作影響到理論、實用類的文章，不再被稱爲文，而稱爲筆。在範圍上，文學有了新的地位。六朝的詩、賦，和俳諧文，在視覺和聽覺方面，由其形式美到內容美，使人樂於琅琅曼吟，回味不盡。充分發揮了中國文字的特長，也同時開闢了文學的新天地。

梁昭明太子選文，以：「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。」者爲標準。舉凡經、史、子中的文字，都被排斥與摒棄。這種破除傳統的新觀念，給文學劃出了一個明顯的領域。

梁書文苑傳：「夫文者，妙發性靈，獨拔懷抱。」是指出文學的思想的美，情感的真，微妙

的心靈，需憑藉新穎的想像創造。這種獨特的見解，一掃舊習；使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。

北齊書文苑傳：「達幽顯之情，明天人之際；其在文乎？」是說明文可通幽微，達博大；它的境界自然高超。

顏氏之推家訓：「文章之體，標舉興會，發引性靈。」所謂標舉興會，發引性靈，正是解釋真摯的流露，要藉美的形式和技巧來表達。

文學觀念的改變，由創新而來；創新的能力，則出於情感的真純，和思想及智慧的力量。在這一節的敘述中，可以充分的感覺出來。

卷、唐至宋的文學思想

文學有回流，正像晚潮於衝擊的力量後，繼之為寂然的退轉一樣。

魏晉南北朝時代，是一個各國分立的時代，亦是一個變亂至極的時代；五胡亂華之後，南北分治，社會秩序，為之破壞至巨；富者生活多奢侈荒淫，貧戶多流離失所；生命的無常，時間的幻變，現實的可悲，理想的粉碎；使文人的思想，傾向於悲觀消極。老莊與神仙的思想結合，產生了陶淵明、謝靈運、鮑明遠、謝玄暉等詩人的思想與風格；南北朝感染佛教的出世觀念，文士更樂於沈浸於自然境界，以陶冶個人的心身，作品的內容，遂多空靈。經過個人主義為表現中心的一段時間，南方文學中，流行極廣的詩，遂由清音婉妙，明轉天然的特色，變為輕浮淫哀（如子夜歌等）；而北方文學亦由峻拔慷慨的音調（如敕勒歌和木蘭辭等），而逐漸為頹廢綺靡的音

調所掩蓋。因此，南北朝後期的文學，遂成爲形式堆砌，內容空洞；或語句怪僻，晦澀難懂的了。純文學的創作道路是正確而可貴的，但是作者的思想，需要遠大而深厚；作者的情感，需要高尚而純真。

綺麗的文風，流弊至大。唐代的文學上的復古運動，便由陳子昂提倡有風骨的樸實的漢魏文學，反對晉宋以後的頗廢的綺靡的文學，而展開了。他在與東方左史糾修竹篇的序文裡發表他對文學的見解說：

「文章道弊五百年矣。漢魏風骨，晉宋莫傳；然而文獻有可徵者。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，采鑑彌繁，而興寄都絕，每以永嘆！竊思古人，常恐遂迤邐唐，風雅不作；以歎歎也。」

他的名詩登幽州臺歌：

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；

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

對渺遠的古人的情思，言深而意遠。

李白也是位復古論者，他說：

「梁陳以來，艷薄斯極。沈休文又尙以聲律。將復古道，舍我其誰？」

這幾句話，說明了他復古的抱負。

在文學的思想上，聚復古的氣運，集復古運動的大成的人是韓愈。他的眼光是政治的，也是文學的；在政治上他非佛非老而尊儒，在文學上他精研古書而主張文以載道。他的信念堅強，宣

傳有方；努力發揚以儒教為中心的理論，並以孟子以後道統的絕續自任。結合文友，推展開文起八代之衰的大運動。他主張文以立意為宗，進而達到文以貫道之旨；他的這一觀念與做法，終於使文學與儒教結成不解之緣；予六朝駢偶綺艷的詩文以掃蕩，同時，也給純文學的新理論與新方法以打擊。但韓愈的為文為詩，並未曾拘泥於古，且多新創；是知其意，乃在矯正文人頹廢與病態的思想和感情，以古典主義的回流，灌漑當時消極的文風，歸於實用一途。其間柳宗元的主張，亦與韓愈大致相同；更使此一運動為儒教所重。遂能由唐到宋，歷經約一千二百餘年之久，保持不墜。自然這是因為唐為藝術與文化的黃金時代，國運昌隆，才能厚植根基使然。亦是與儒家政治密切結合，才能臻此。

而歐洲十六世紀在文學上古典主義思潮的產生，較此約晚千年。

文以載道的這一主張，以南宋的理學極盛，而更顯明地揭示了這一意旨。但却離孔子對文學廣然曠遠的思想日遠，終為偏狹的道德觀念，與不切實用的教條主張所束縛，而強欲使文學降為道德與教條的附屬品，實在是捨本逐末的現象。這正好像婦人纏足，成為觀念上的一種惡習。

程頤說：「道者文之根本，文者道之枝葉。」他認為作文害道，且不能與天地同其大；因為在他眼裡，文是斂物喪志之物。

宋濂說：「明道之謂文，立教之謂文，可以輔化民之謂文；斯文也，果誰之文也？聖賢之文也；非聖賢之文也。聖賢之道充乎中，著乎外，形乎言，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；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，文之至也。」

從這一段牽強附會，似是而非的話中，使我們知道，如果文學是鳥，則鳥被關入籠中了；如果文學是活潑成長的孩子，則孩子已被砍去了手和足。文學本體的價值，已被空洞的，不切實際的，沒有生命的短見所抹殺；真的感情已遭摒棄，自由的思想已被窒息；摹倣的惡習，將活用的文字僵化；庸俗的腐尸高高在上，創作的色彩，黯然無光；風格遂被湮滅，個性亦不存在。文學之被囚於黑暗，正此之謂。

文學無創作，則等於死亡。

肆、明末的文學思潮

文學亦如春流，一波波湧現；有滯礙、有奔放、有微濶、有急浪、有曲折、有浩蕩；總是不斷的向前流着。

明時，顧炎武所著日知錄中，其論詩文處多精義，謂近代文章之病，全在摹倣。黃宗羲則極力主張，破除文章門戶之見，於積重難返之中，振文士逐末之習，而能自成一家。

明末萬曆年間，有名的公安派的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三人，反對當時文人：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的說法；對文學提出了「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。」的新見解。其中以袁宏道中郎尤為著名，他在敍其弟小修詩說：

「泛舟西陵，走馬塞上，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；足跡所至，幾半天下；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。大都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。非從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筆。有時情與境會，頃刻千言，令人

奪魂。」

在靈壽閣集序中說：

「夫古有古之時，今有今之時，襲古人語言之迹，而冒以爲古，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。」

與邱長儒書：

「大抵物真則貴，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，而况古人之面貌乎？唐自有詩也，不必選體也；初盛中晚自有詩也，不必初盛也；李、杜、王、岑、錢、劉，下逮元、白、盧、鄭，各自有詩也，不必李、杜也。趙、宋亦然，陳、歐、蘇、黃諸人，有一字襲唐者乎？至其不能爲唐，殆是運氣使然，猶唐之不能爲選，選之不能爲漢、魏耳。今之君子，乃欲概天下而唐之，又且以不唐病宋；夫既以不唐病宋矣，何不以不選病唐，不漢魏病選，不三百篇病漢、魏，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？……夫詩之氣，一代減一代，故古也厚，今也薄。詩之奇，之妙，之工，之無所不極，一代盛一代，故古有不盡之情，今無不盡之景，然則古何必高，今何必卑也。」

又與友人論詩文中說：

「公所謂古文者，至今日敝極矣，何也？優於漢，謂之文，不文矣；奴於唐，謂之詩，不詩矣。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，謂之詞曲諸家，而不詞曲諸家矣。」

以上所述，均在指陳真的感情的獨創之可貴，抄襲摹倣古人之作的低賤可鄙。

袁宗道也在論文下篇首說：